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21.05.003

林纾、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及其作用对比研究

胡萍英, 张家秀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闽籍翻译家林纾、林语堂分别以文化及文明的“引入者”和“输出者”两种不同的角色, 致力于他们所处年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民族危难的时代背景催生了林纾的翻译救国思想动机, 旅居国外的林语堂精通中西文化, 形成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智慧的译创思想。由于翻译思想迥异, 他们在文化输入与输出、醒民救亡与性灵闲适选题、归化意译与异化美译策略方面存在差异, 但林译小说和林语堂译创的英文作品所传递的思想内容不但与目的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 而且满足目标读者的期待, 因而在译入语社会得到广泛传播, 并对目的语社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构建作用。

关键词: 翻译思想; 林纾; 林语堂; 翻译题材; 翻译策略; 译作传播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1)05-0418-0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n Shu's and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HU Pingying, Zhang Jiaxiu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Lin Shu and Lin Yutang, one as an “importer”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 other as an “export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had devoted to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age they lived. China being in dire peril led to Lin Shu's ideological motivation of translating foreign novels to save the nation. Living abroad and being proficient in east and west cultures, Lin Yutang generated the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thought of spreading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isdom to the West. Their different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motivations resulted in different selection of culture input or output, subject matte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like domestication or foreignization. Both Lin Shu's and Lin Yutang's translations were popular in the target society because their translational ideology chimed in with the mood of the target countries. Therefore their translations had constructive effects on culture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target society.

Keywords: translation thoughts; Lin Shu; Lin Yutang; subject matter; translation strategy; popularity of translated works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是中国近代对内译介西方文学的先驱,而学贯东西的林语堂是现代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世界知名学者,两位闽籍翻译家为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学界对林纾和林语堂(下称“双林”)的翻译研究不少,但是以“林纾、林语堂、翻译研究、对比”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尚未发现对两人翻译的对比研究,故本研究试图

通过对比研究林纾、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及其对文化翻译实践和文化交流的影响,解构翻译思想观念对文学翻译和文化传播的影响机制,揭示译者主观能动性对翻译实践、译作传播以及对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反拨效应的决定性作用,以期对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林纾、林语堂迥异的翻译思想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人成长经历和受众期待促使林纾、林语堂形成迥异的翻译思想。他们翻译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翻译的思想动机都出于爱国,但是具体表现方式大不相同:林纾的翻译思想动机是借助西方文化之精神力量,唤醒国人奋起救国保种的斗志;林语堂的译创思想是对外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的智慧,宣扬“闲适”“性灵”“幽默”的人生观和文化观,为西方读者呈现真正的中国文化及其精神。

(一) 林纾的翻译思想

林纾出身贫寒,自幼酷爱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文学底蕴深厚,古文造诣极高。他所处的时代,落后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使林纾萌生翻译救国的思想。在民族危难时刻,林纾表现出强烈的救国保种意识和顽强的抗争精神,他呼吁国人放弃民族偏见,学习外国的长处,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维新图强;他借助译作极力宣扬实业强国、民主民权、妇女解放等先进思想,以启蒙和教化国民;此外,林纾坚信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以在与西方殖民文化的碰撞、交锋中,他始终坚定地捍卫古文的地位。^[1]林纾的翻译爱国思想意识体现在对翻译题材、翻译策略和译作文体的选择和应用方面。林纾尤其重视译著的启蒙、教化功能,他为其译著所作的序和跋多数是为了醒民和救亡。坚持用古文译介外域小说,传播西方文化和先进思想,是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反抗殖民文化侵略的真实写照。

(二) 林语堂的译创思想

林语堂生长于基督教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语言文化的浸染,后游学美国和欧洲,仰慕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成年后才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和古老的哲学思想,他尤其欣赏老庄思想。他生活的时代,中国革命运

动此起彼伏,战火硝烟弥漫,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促使林语堂移居美国。旅居国外的林语堂既熟知中国文化的精髓,又了解西方文化的缺失,于是他产生了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智慧的译创思想,有意以中国文化之长弥补西方文化之短,也让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由于对人类生命的悲剧性本质有充分的感悟,林语堂推崇“闲适”“性灵”“幽默”的思想观念,他建议人们创造一种积极快乐的人生观,以消解人类在宇宙面前的悲剧感。^[2]面对中外文化碰撞和冲突,林语堂站在世界多元文化的立场,以宽容的心态包容东西文化差异,运用自己的学识、智慧和幽默融通东西文化,其幽默感时常表露出闲适和性灵的超脱境界,使中西幽默在笑对挫折、化解烦闷、舒展心灵、应变人生中达成一致。^[3]

二、林纾、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文化翻译的影响

翻译操控派学者安德烈·勒菲佛尔(Lefevere)提出翻译改写理论,指出制约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和诗学。^[4]本研究探讨的翻译思想是指操纵或影响翻译的意识形态,包含译者个人的思想观念、读者期待视野和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译者受自己的思想观念、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形成了翻译思想,即翻译意识形态。译者的翻译思想指引自己的翻译实践,隐形操纵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主要体现在对翻译作品选题和翻译策略应用的操控。

(一) 翻译选题差异

林纾、林语堂在文化翻译实践中相向而行,林纾通过翻译域外小说输入外国文化和先进思想;林语堂则通过译创英文作品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在译介作品题材的选择上,林纾注重原作的醒民和教化功能;林语堂则选择远离政治、亲近自然、充满哲学思想、闲适优美的文学作品,主要聚焦性灵、闲适的选题,以传达其超然独我和优雅养性的思想,体现其追求性灵、闲适、自然、本真、近情的人生理想。

1. 林纾的醒民、救亡选题

为了寻求社会改良的精神武器,林纾以一介不谙外文的古文家身份大无畏地登上了翻译舞台,坚持在中国文化场域内,对内传播域外先进文

化和西方文明,以激发国民维新图强、爱国救亡的激情和决心。比如,林译小说《现身说法》反映 19 世纪俄罗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呼吁国人清醒地认识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问题,为爱国保种而顽强抗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袒露其民族主义心迹,表达在抵御外侮的大环境下以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方式爱国保种的思想;《爱国二童子传》宣扬实业救国思想,鼓励国人兴办实业,以增强国力,实现强国强军。此外,林译作品所传递的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孕育了反封建的现代精神,促使民众的思想解放,也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比如林译《离恨天》《迦茵小传》《铸情》等言情小说讲述爱情悲剧故事,歌颂纯真爱情,批判世俗和偏见,肯定了女性享有爱情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5],对女性启蒙和解放发挥积极作用。林纾用古雅的文言翻译域外小说,填平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沟壑,影响了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在内的一代文豪。

2. 林语堂的性灵、闲适选题

成长于中西文化的林语堂熟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势与不足,为了让西方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及其精神,他选择翻译或用英文创作以性灵和闲适为主题格调的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在目的语(西方)文化场域内,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有意以中国文化之长弥补西方文化之短。比如,林语堂翻译的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记》)以“性灵”“闲适”的风格,介绍中国人的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等,对闲适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幸福追求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赞赏充满个性才情和闲情意趣的生活态度,译者与原著主人公相契合的人生态度及个性气质跃然纸上。林语堂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经典文化作品,如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 (《老子的智慧》或《道德经》),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华民族经典文化和古老哲学的通俗读本。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作品,比如 *The Gay Genius* (《苏东坡传》)、*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等,均大力弘扬道家思想,把道家学说当作中国人美德和智慧产生之根源,鼓励人们以老庄哲学思想为指导,认识历史、观察社会、体验人生。

(二) 翻译策略差异

在文化翻译实践中,林纾在“拿来”异域先进思想文化为我所用的翻译观照应下,采用归化为主的意译策略,在保持原作主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式改写和“有意创译”,以达到醒民救国的翻译目的。林语堂在“送去”中国优秀文化以融通中西文化的翻译思想指引下,采用异化为主的美译策略,对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进行“理性译创”,充分展现原文意境,使译文达到“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6],以满足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及对中国文化的好奇。

1. 林纾归化为主的意译策略

因不懂外文,林纾翻译实为口译笔述的合译方式,但是从林译小说及序跋可知林纾翻译思想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林纾依据自己对原著核心内容的理解,采用归化的意译策略,应用意译、创译、改写、删减、增译等方法,使用“仿古文”对原著及其书名和文体进行中国式改写,以便更好地诠释其醒民救国的翻译动机;同时林纾译作的序跋对启蒙和教化民众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林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译自英国小说家 Haggard 的 *Montezuma's Daughter* (《蒙特祖玛的女儿》),为了颂扬忠孝之道和不屈不挠的复仇精神,林纾把书名进行了改译,将小说的中心人物由蒙特祖玛的女儿(墨西哥公主 Otomie)变成英国孝子 Thomas;林纾渲染墨西哥人宁死不为奴、誓死抵抗西班牙敌寇入侵的情节,期望墨西哥人的英雄气概能够激发国人图雪国耻的斗志;该译著也提醒国人落后和愚昧必将导致国破家亡。林纾把英国作家 Scott 的历史小说 *Ivanhoe* (《艾凡赫》)创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把原著的历史传奇故事改译为传记文体,目的是让读者看到历史故事背后的民族主义思想。此翻译策略所生产的译作颇多,不一一罗列。显然,归化翻译策略是林纾翻译实践的选择,他通过有目的地改译或创译,向读者再现和强化自己需要的声音,同时湮没那些“无关紧要”的声音^[7]。

有时林纾也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性直译一些内容,让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异国风情。林译小说中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比如, *Montezuma's Daughter* 的作者名字 Haggard 被林纾音译为“哈葛德”、主人

公英国孝子 Thomas 被译为“汤麦司”、蒙特祖玛的女儿 Otomie 直译为“倭土米”等等。

2. 林语堂异化为美译策略

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实践中,林语堂采用异化为美译策略,即借助不同层面的形式“越位”策略,创造出译文的形式美:浑整美、闲淡美与和谐美^{[8]49};同时灵活运用直译、意译、加注、编译等变通的手段,应对不同语境和不同文化的挑战,成功地将诸如苏东坡、李清照、沈复等古代名作家的经典作品译成英文。在翻译过程中,林语堂既维护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也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入语社会文化背景,坚持以句为本位,既传达原文的形式和精神,又照顾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译文达到“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6]。比如,沈复的《浮生六记》以纯美的文字记叙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其间蕴含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用通俗易懂、诙谐生动的英语,将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艺术化,将一种偏重于精神上的愉悦和幸福感的文化观念传递给西方读者,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在西方强势文化语境中为中国文化挣得话语权。

林语堂向西方人成功译介中国文化的秘诀在于其娴熟的语言转换能力和灵活的文化处理策略。首先,为了应和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和向往,林语堂采用异化的直译方法,形象生动地传递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时,保留了沈复的文体结构,完整地翻译原文,忠实地呈现源文化;运用加注和编译的方式,避免了文化差异导致的不解和误会。例如,卷一《闺房记乐》中作者新婚蜜月刚过,其父便使之去杭州学习,他不得不与新婚妻子离别的句子:

原句:

……授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9]14}。……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9]16}。

译文:

……I was under the tutorship of Chao Shengtsai of Wulin (Hangchow)^{[9]15}. ... When I went up on board the boat, I saw the peach and pear trees on the banks were in full bloom, but I felt like a lonely bird that had lost its companions and as if the world was going to collapse around me^{[9]17}.

第一句中的“武林”是旧时杭州的别称,林语堂特意在 Wulin 后加注 (Hangchow),以避免西方读者把“武林”误解为武术界。第二句表达了作者遵从父命离家拜师学习的心情,他用了两个比喻,夸张而又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对新婚妻子的眷恋和不舍。林语堂将之直译过来,让目标读者理解作者夫妇纯真的感情,也了解“父命不可违”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次,在必要和合适的时候,林语堂也采用归化的意译方法,借用意义对等的英语表达法或俗语来翻译中国习语,以便西方读者理解和欣赏。又如,卷一《闺房记乐》中关于一亭子命名的句子:

原句:

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9]18}。

译文:

Over the bridge, there was an open hall overlooking the water, called “After My Heart”— the reference was to an old poem: “When the water is clear, I will wash the tassels of my hat, and when the water is muddy, I will wash my feet”^{[9]19}.

亭子的名字叫“我取”,是参照《孟子·离娄上》中的诗句“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其意思是“水清时,我可以洗缨;水浊时,我可以洗脚;正合自己的心意。”根据诗句的意思,亭子名“我取”意为“正合我的心意”,与英文“after my heart”的意思一致,于是林语堂就直接借用现成的英语表达来翻译“我取”,这样的英译,既使亭子的名字地道,又缩短了受众与译文的距离。不过,笔者认为译者应该在英文句末对“自取之也”进行加注说明(That is after my own heart),否则仅从诗句的意思直接跳越到“我取”(After My Heart),西方读者或许疑惑:“水清时洗缨,水浊时洗脚”与“正合我心意”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在林语堂看来,译本在语言形式上必须“句译”,而内容上必须“传神”求“美”。语言转移可以跨越层级越位,不同语篇的体裁结构可以杂合,东方形象与西方形象也可以相融,只有语言形式转换和作品内容传神和谐统一,达到审美效应的对等,才能构成理想的翻译^{[8]50}。林语堂在兼顾西方读者理解的同时,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既传播了中国文化,又有效捍卫了中国文化

化的话语权。

三、林纾、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林纾、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对其翻译作品的成功传播及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双林”译作的广泛传播对译入语社会文化产生反拨效应。林纾翻译的小说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广为流传,“林译小说”影响了一代人,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林语堂译创的英文作品展现闲适、性灵和幽默的风格,恰到好处地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期待,丰富了西方文化内容,因而在国外被广泛传播,在当时美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 林纾创译小说的传播效应

在翻译救国思想指引下,林纾选择契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题材、采用恰到好处的归化意译策略、使用浅近而文雅的仿古文言,翻译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近100位作家的183种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为主;同时林译小说的序跋不仅呈现林纾的翻译思想,而且满足当时国人和国家叙事的精神需求,因而林译小说赢得受众的喜爱,得到商务印书馆、《平报》《公言报》等出版机构的支持,得以在当时的中国大地广泛传播,林纾也因此蜚声文坛。域外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当时的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林译小说所承载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为启蒙和教化国民、开通社会风气发挥积极作用,孕育了挑战封建社会落后思想的反叛精神;为当时落后挨打的中国注入精神力量,激发国人维新图强、救国保种的斗志,充分展现小说的社会改良功能;为文学与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借鉴,因而得到诸多文化名人的青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极大影响。此外,林纾用古雅的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不仅颠覆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提升了小说家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还大力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文的地位。总之,林译小说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林语堂译创作品的传播价值

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思想的感召下,精通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选择能满足西方读者期待的题材、采用意译为主的美译策略、使用通俗易懂的英

语,翻译或创作体现性灵和闲适主题格调的中国优秀文学和文化作品,以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和古老的智慧,因而赢得西方读者的认可,也得到外国出版商的支持,促使其文化作品在国外广泛传播。学贯东西的林语堂以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外文化,他既清楚中国文化的精华,亦了解西方文化的错失,明白工业革命给现代西方人带来的快节奏生活压力和苦恼,因此在其作品中一再强调悠闲的重要性,这恰到好处地满足了读者的期待,也丰富了西方文化。林语堂以智慧、学识和幽默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通过中外语言杂合和中西文化对话,跨越中外文化差异之天堑鸿沟,在东西语言文化对比中突出中国文化形象,达到“以西衬东”的效果,促进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总之,林语堂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作家,更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中西文化大使,他一生致力于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他译创的中国文化作品展现出中华文化自信、多元文化意识、读者期待关切及其文化翻译观,对当下中国文化形象的海外输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双林”的翻译思想对其译作的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两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契合当时译入语社会及目标读者的期待,因此其译作在目的语社会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双林”翻译作品的成功传播对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构建作用,同时“双林”的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文化观对目标文化重建和创新也具有积极影响。

四、结语

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可以使相似文化相得益彰,使异质文化相互理解和包容,从而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使民族的智慧变成人类的智慧。译者作为中外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使者,首先应该学习林语堂先生站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构建译者主体的理性意识,发挥翻译意识思想意识的“平衡杆”作用,自信而又生动地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其次,应该学习林纾先生将自身的翻译思想与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接,将西方文化意象和价值标准进行中国式改写,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翻译。

(下转第439页)

[10] 福州一宝——纸伞[N]. 人民日报, 1980-11-02(2).

[11]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州市志第三册[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1028.

[12] 卢美松. 福州通史简编[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695.

[13] 蔡小伟, 赵鹏. 为民族自主品牌护航[N]. 人民日报, 2004-04-12(11).

[14] 何光锐. 福建: 一个工艺美术大省的雄心与作为[N]. 福建日报, 2006-09-07(5).

[15] 丁凡倬. 传技·守艺: 探究福州油纸伞的民俗底蕴与美学价值[J]. 美术大观, 2018(2): 70-71.

[16] 谢添实. 福州牛角梳: 有多少风采可以重来? [J]. 福建质量信息, 2006(4): 28-30.

[17] 傅彤. 浅谈福州脱胎漆器的生存与发展[J]. 艺术教育, 2019(3): 189-190.

[18] 时光里的福州故事. 福州牛角梳能否再创一个流行产业? [J]. 福建轻纺, 2017(2): 31-32.

[19] 谢·卡拉-穆尔扎. 论意识操纵(上)[M]. 徐昌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4.

[20] 李海文, 谢清果. 诗性传播: 中国姓名的大众传播之道[J]. 教育传媒研究, 2019(6): 52-56.

[21] 郑雨萱, 邓忠卫, 丁晓雄. 知否知否, 应是建阳建盏——电视剧《知否》引发建盏新热潮[N]. 福建日报, 2019-03-21(8).

[22] 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室. 地理(第4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54.

[23] 福建省旅游局导游办公室. 新编导游基础知识[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8:314.

[24] 方玲. 让品牌爱上包车: 合肥地铁品牌包车传播案例及传播价值[J]. 中国广告, 2017(12): 46-48.

[25] 詹姆斯·W.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17.

[26]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69.

(责任编辑: 王圆圆)

(上接第 422 页)

再次,要了解作品源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更要捕捉不同民族文化的共识、读者的期待和向往,以“统一分析与理智重建的方法”^[10],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进行适当的重构,既尊重原作的基本思想内容,也照顾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此外,中国译者的翻译意识形态应建立在正确理解和领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充满深情,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在翻译活动中能够秉承客观、平等的态度,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履行国际文化交流使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胡萍英. 林纾与林语堂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0, 29(12): 55-59.

[2] 王兆胜. 《闲话林语堂》自序[J]. 理论与创作, 2003(2): 78-80.

[3] 林语堂. 论幽默[M]//林语堂名著全集: 第14卷.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4-12.

[4]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16.

[5] 梁桂平. 林译言情小说中的女性观[J]. 求索, 2006(8): 204-205, 175.

[6] 林语堂. 论翻译[C]//《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123.

[7] 胡萍英. 林纾译作书名的批评话语分析[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5(2): 66-70.

[8] 陆洋. 论“美译”: 林语堂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5, 26(5): 49-55.

[9] 沈复. 浮生六记[M]. 林语堂,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10] E. 卡西勒. 启蒙哲学[M]. 顾伟铭等, 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4.

(责任编辑: 王圆圆)